

【农村·农民·农业研究】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精神健康

——基于珠三角外来农民工的实证调查

聂伟,风笑天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现有文献分析表明,对农民工城市融入与精神健康的关系研究尚缺乏系统性的经验研究。本研究利用珠三角 3086 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并以客观指标为代表系统地考察城市融入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欠佳;经济融入维度的劳动力市场融入、劳动权益保护融入、住房融入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产生重要的影响;社会融入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具有调节作用。流动的劳动体制致使农民工难以全面融入城市,损害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全面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改善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农民工;城市融入;精神健康

中图分类号:C913.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13)05-0032-09

一、问题的提出

《201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已接近 2.6 亿,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 1.6 亿左右,且数量呈日益上升的趋势,农民工成为城市就业的主体,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然而,一方面,流动的不确定性给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带来了新的风险和问题。2010 年,“富士康事件”之后,农民工精神健康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和工作中面临着巨大挑战,由于一系列制度和非制度因素,农民工游离于城市正式制度和社会组织之外,构成了城市的异质体和边缘化群体,难以融入城市问题突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会对其精神健康带来怎样的影响?全面评估城市融入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外研究表明,精神健康问题是移民社会融入

后果研究的重要关注点;移民的社会融入对精神健康具有促进作用,社会融入度越高,越能通过社会参与获取社会支持,汲取物质和精神资源,精神健康状况越好。^[1-2]然而,我国从城市融入这一视角系统探讨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研究还很少见。目前,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总体呈现“半城市化”趋势,且群体内部呈现分化,日渐分为“温饱型”“小康型”和“发展型”^[3],城市融入状况的差异是否会影响到农民工的精神健康?本研究利用珠三角 3086 名农民工调查数据,在总结此前的研究基础上,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精神健康的关系作初步的探讨。^①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006 年国内学者开始在不同城市对农民工精神健康开展实证调查。^[4]何雪松研究发现,城乡迁移群体中 25% 的男性和 6% 的女性精神健康状况不好。^[5]其他相关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到相似的

收稿日期:2013-05-06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3-09-09

基金项目: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11YJC840047);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CXZZ13_0014)

作者简介:聂伟,男,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劳工研究、青年社会学。

风笑天,男,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研究方法、独生子女问题研究。

① 本文使用的“珠三角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由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结论,外来务工人员的精神健康欠佳^[6-7],精神健康问题突出。就影响因素而言,在内因因素上,既有研究表明,性别、婚姻状况、年龄等个体特征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具有显著的影响。^[8] 在外在因素上,相关学者主要从单一制度结构、关系网络、生存体验等视角对农民工精神健康进行探讨^[9],但都缺乏系统地从事融入的角度探讨农民工的精神健康。

农民工城市融入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强调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的继续社会化过程,在城市确立经济地位,适应城市的互动规范,并获取市民身份、享受市民待遇,最终实现在城市舒适生活的融入过程^[10];主要包含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的全方位融入。^[11-12] 不同学者在城市融入的具体指标测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基本得到关于城市融入相似的结论,当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处于初级阶段。总体而言,在此次实证研究中,为避免心理融入的相关变量(城市归属感、留城意愿、身份认同等)导致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所以本研究放弃了主观臆断且难以测量的心理融入相关变量,主要以客观指标考察城市融入(经济融入和社会融入)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的影响。国内部分学者零星的实证研究认为城市融入对移民的精神健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城市融入程度越高,其精神健康状况越好。

1. 经济融入与农民工的精神健康

经济融入强调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劳动力就业、劳动权益保护、住房等方面的融入状况,是农民工个体经济地位的综合反映。^[13]

(1) 劳动力市场融入与精神健康

劳动力市场融入主要强调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收入以及工作状态。经济与就业压力与移民的精神健康不佳具有直接的关系。^[5] 较低的工作收入会给移民的带来较大的心理和生活压力,最终影响其精神健康。^[14] 就业状态影响移民的精神健康,失业导致个体负面情绪的产生,降低个体的精神健康水平。^[15] 个体相对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具有显著的影响。^[4] 农民工外出的主要动机在于个人发展与经济取向,经济和就业状况对于农民工至关重要。^[16] 劳动力市场融入是农民工在城市中物质生存状态的体现,而农民工精神健康是物质生存状态的反映,于是设立以下假设:

假设 1.1: 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融入度越高,其精神健康状况越好。一般认为农民工的月收支

比越高、找工作越容易,其经济和就业压力越小,其精神状况越好,据此设立下面 2 个子假设:

假设 1.1a: 农民工的月收支比越高,其精神健康状况可能更好。

假设 1.1b: 农民工找工作越容易,其精神健康状况可能更好。

(2) 劳动权益保护融入与精神健康

劳动权益保护涉及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的劳动强度、工作环境、合同签订、职业福利等权益。劳动权益与外来工的精神健康存在较高的关联度,超时加班、工作环境有危害和强迫劳动会恶化外来工精神状况^[17-18];城乡二元社会保障结构对外来工精神健康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7] 由此可见,劳动权益状况直接决定农民工的生存状态,进而影响到农民工的精神状态。鉴于上面的研究,我们认为工作场所的人身权利侵害,可能会导致个体抑郁,损害其精神健康。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对农民工的工作起着保护伞的作用,促进其精神健康。被扣工资者往往感受到较大的经济压力,是农民工负面应激事件的一个重要来源,可能损害精神健康。对劳动权益是否有意见,反映了不同外来工对权益状况的敏感程度和主观认识,对劳动权益有意见者精神健康状况可能更差。^[17] 由此形成下列假设和子假设:

假设 1.2: 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护融入度越高,其精神健康状况可能更好。

假设 1.2a: 签订劳动合同者,其精神状况可能较好。

假设 1.2b: 被扣工资者,其精神健康状况可能较差。

假设 1.2c: 社会保险获得越多者,其精神健康状况可能更好。

假设 1.2d: 人身权利被侵害越多者,其精神健康状况可能更差。

假设 1.2e: 对劳动权益有意见者,其精神健康状况可能更差。

(3) 住房融入与精神健康

住房是农民工在城市安居的前提,居住环境对移民的精神健康具有突出的影响。^[19] 聚居者生活在有限的空间内,在集体生活中易产生负面事件,并且压力难以释放;与散居者移民相比,聚居者移民的精神健康状况更差。^[20] 一般认为,农民工的人均居住面积越大,住房质量越高,其居住环境越好,精神健康状况越好。于是设立假设和子假设:

假设 1.3: 农民工的住房融入度越高,其精神

健康状况可能越好。

假设 1.3a:与居住在集体宿舍者相比,居住在出租屋内、自购房者、其他住房者的精神状况可能更好。

假设 1.3b:农民工的人均居住面积越大,其精神健康状况可能越好。

假设 1.3c:农民工的住房质量越高,其精神健康状况可能更好。

2. 社会融入与农民工的精神健康

社会融入是经济融入层次上的进一步发展,与经济融入强调收入、劳动权益、住房等经济状况不同,社会融入强调农民工在社会交往、社会组织、社会互动等的融入;社会交往既指同群体的交往,也包括异群体的交往,特别指与当地人的交往。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精神健康或心理健康研究,诸多实证研究深入探讨社会交往的各个因素与精神健康的关系。相关学者研究表明,社会关系网络具有情感支持、精神慰藉的正功能,积极的关系网络能够减缓周遭不良环境对精神健康的负面影响。^[21-22]群体性和实体性交往能够减少农民工抑郁状态的发生,而虚拟性交往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9]社会网络密度中,与同事和邻居的交往对外来工的精神健康水平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但网络的异质性对外来工的精神健康产生消极影响。^[4]与本地人交往是否通畅是影响精神健康的显著因素,生产线上老乡数量较多者,精神健康状况更差^[17]。工会等组织的支持等也影响着移民的精神健康。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脱离原有乡村的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在城市的社会交往和组织参与对于农民工的物质生活和精神健康都至关重要。鉴于以上研究,我们可以推测对当地方言越熟悉,其社会交往面越宽;越容易融入城市,越可能与当地人成为好朋友,建立新的社会网络;社会排斥感越弱,其精神健康状况可能越好;参与社会组织或其他组织越多,获取的社会支持越多,越不可能出现抑郁或孤独的精神状态。于是设立假设和子假设:

假设 2: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度越高,其精神健康状况可能更好。

假设 2a:农民工的亲密朋友数量越多,其精神健康状况可能更好。

假设 2b:新生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精神健康具有正面影响。

假设 2c:对当地语言越熟悉者,其精神健康状况可能更好。

假设 2d:参与组织越多者,其精神健康状况可能更好。

三、研究数据与变量选择

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蔡禾教授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的问卷调查,调查在珠江三角洲九个城市展开,最后获得正式就业农民工的有效问卷 3086 份,采用 SPSS18.0 和 Stata11.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变量设计

(1) 因变量

本研究因变量为农民工精神健康,精神健康采用 Hopkins Symptoms Check List (HSCL) 量表的简化版来测量,量表由 9 个问题组成(见表 1),回答者从“从来没有”“偶尔有”“说不清”“经常有”“总是有”进行选择,并分别赋值为 1 到 5 分,主要测量焦虑和抑郁的内容。

| | 抑郁因子 | 躯体化因子 | 共量 |
|----------|---------|---------|--------|
| 失眠 | 0.0475 | 0.7548 | 0.4281 |
| 觉得身心疲惫 | 0.2304 | 0.7388 | 0.4011 |
| 烦躁易怒 | 0.2276 | 0.7153 | 0.4365 |
| 容易哭泣或想哭 | 0.2630 | 0.4781 | 0.7022 |
| 觉得前途茫然 | 0.6115 | 0.3263 | 0.5196 |
| 感到很孤独 | 0.5587 | 0.3333 | 0.5767 |
| 觉得自己没有用 | 0.7960 | 0.0922 | 0.3580 |
| 觉得生活很艰难 | 0.6715 | 0.2759 | 0.4729 |
| 觉得活着没意思 | 0.7259 | 0.0908 | 0.4648 |
| 特征值 | 2.47388 | 2.16628 | |
| 方差贡献率(%) | 0.2749 | 0.2407 | 0.5156 |

先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精神健康指标采用方差极大化方法对因子负荷进行正交旋转,共抽取两个因子。KMO 值为 0.8658, Bartlett 球形检验 $p=0.000$, 其方差贡献率达到 51.56%, 总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为 0.8011, 将这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抑郁”因子和“躯体化”因子,两个因子的 Cronbach's Alpha 信度系数分别为 0.7510、0.6731。根据因子负载,抑郁因子包括“前途茫然”“感到很孤独”“觉得自己没有用”“觉得生活很艰难”“觉得活着没意思”等项目;躯体化因子包括“失眠”“觉得身心疲惫”“烦躁易怒”“容易哭泣或想哭”等项目。为了把精神健康用一个变量来表示,笔者把两个因子的值分别乘以其方差贡献率后相加,

即:总的精神健康因子值=抑郁因子值 $\times 0.2749$ +躯体化因子值 $\times 0.2407$,我们可以将上述综合变量的因子得分,作为精神健康指标,得分越高,表明精神健康状况越差。为了在回归模型中更为清楚地分析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运用公式把精神健康因子值转换为1到100之间的指数^①。

(2) 自变量

本研究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来考察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经济融入主要从劳动力市场融入、劳动权益保护融入、住房融入三个方面来测量。

①劳动力市场融入操作化为月收支比,找工作的难易程度。月收支比即为月收入与月支出的比值;找工作的难易程度,回答者从很困难、比较困难、一般、比较容易、很容易进行回答,我们对其分别赋值为0、25、50、75、100分,得分越高代表找工作越容易。

②劳动保护融入操作化为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是否被扣工资、社会保险参与、人身权利侵害、是否对企业劳动权益有意见等5个指标。其中社会保险参与从“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中提取公共因子^②,以公共因子作为自变量,社会保险因子的得分越高,代表着享受的社会保险越多,并运用公式把因子转换为1到100之间的指数^③。人身权利侵害通过询问被访者“在企业内部是否有包括吃饭时间不够、上班时不允许喝水、上班时未经允许不能上厕所、被搜身或搜包、被怀疑偷窃、被管理人员殴打、被关押、工作环境对身体有危害等遭遇”,只要有过一项遭遇,计1分,没有计0分,累加后得到人身权利侵害综合指标,得分越高,代表人身权利侵害越严重。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是否被扣工资、是否对企业劳动权益有意见采用直接测量法。

③住房融入主要操作化为住房类型、人均住房面积、住房质量。住房类型分为集体宿舍(员工宿舍和工作场所)、出租屋、自购房、其他(借住亲友家或宿舍、临时窝棚等)四类;本研究借鉴边燕杰对住房质量的操作化,房屋内是否有热水器、冲凉房、厕所、阳台、厨房、电风扇、衣柜、饮水机、空调、电冰箱等设施,有计1分,没有计0分,累加后得到住房质量指标,得分越高,代表住房质量越好。^[23]

社会融入主要从社会交往、组织参与上来进行测量。社会交往具体操作化为在城市中亲密朋友的数量、新生的社会网络、对本地语言的熟悉程度,其中在城市中亲密朋友的数量采用直接测量。对

本地语言的熟悉程度,被访者从“完全可以听说、基本可以听说、能听但不能说、能听一些但不能说、既不能听也不能说”等五个方面进行回答,我们对上述回答分别赋值为100、75、50、25、0分,得分越高,代表对本地语言的熟悉程度越高。新生社会网络借鉴蔡禾等的操作化,新生社会网络是指在城市生活中构建的社会网络,主要包括企业内的朋友、主管、上级负责人和企业外的朋友,其中最好朋友为当地人,表明新生的社会网络已经进入到当地人的核心层面,新生社会网络较强。因此在问卷调查中逐一询问“最好的三个朋友与本人的关系,是否为当地人”。最好的三个朋友为当地人的数量越多,表明农民工的新生网络越强。^[24]组织参与,包括中共党组织、工会、共青团、同乡会、其它,参与计1分,没参与计0分,累加后得到组织参与综合指标。

(3) 控制变量

主要包括性别、婚姻、年龄、受教育程度。

3. 样本情况描述

调查对象中,男性占53.11%,女性占46.89%;年龄以青壮年为主,平均年龄为27岁;受教育程度水平较高,初中占51.31%,高中(包括中专或技校)占27.21%;在婚姻状况中,未婚者的比例达到55.14%,已结婚者比例为43.50%。本研究所运用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

四、结果分析

1. 农民工精神健康现状

总体来看,农民工经常面对的精神健康问题排在前五位的为“觉得身心疲惫”“觉得生活很艰难”“前途茫然”“感到很孤独”“烦躁易怒”。除两项指标经常有和很严重的发生比率之和低于10%以外,其他指标经常有和很严重两项发生率之和均高于10%,表明农民工的总体精神健康状况欠佳(见表3)。

具体来看,由表4可知,抑郁因子总体得分高于躯体化因子,表明农民工的自我价值感缺乏问题

① 转换公式是:转换后的因子值=(因子值+B)·A。其中,A=99/(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B=(1/A)-因子最小值。(边燕杰、李煜2000:1-18)。

② 社会保险因子KMO值为0.713,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为0.7292,方差贡献率为56.26%。

③ 转换公式同2。

表 2 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基本情况

| 维度 | 指标 | N | 描述 |
|-----------------------|-------------------|------|---|
| 因变量 人口特征 (控制变量) | 精神健康因子 | 2734 | 因子得分最小值为 1,最大值为 100,平均值为 23.46,标准差为 15.76。 |
| | 性别 | 3086 | 男(53.11%),女(46.89%)。 |
| | 年龄 | 3084 | 最小值为 15 岁,最大值为 63 岁,平均值为 27.44,标准差为 8.64。 |
| | 婚姻 | 3085 | 已婚且与配偶住在一起(27.33%),已婚与配偶不住在一起(16.18%),未婚(55.14%),丧偶或离婚(1.36%)。 |
| | 教育程度 | 3083 | 小学及以下(18.52%),初中(51.31%),高中(27.21%),大专(2.95%)。 |
| | 经济融入 | 3007 | 最小值为 0.00005,最大值为 22.5,平均值为 2.41,标准差为 1.66。 |
| | 劳动力市场 | 2897 | 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100,平均值 46.23,标准差 30.60。 |
| | 劳动保护 | 3057 | 签订(42.75%),未签订(57.25%)。 |
| | 是否被扣工资 | 3037 | 是(18.97%),否(81.03%)。 |
| | 保险获得因子 | 3074 | 因子得分,最小值为 1,最大值为 100,平均值为 22.46,标准差为 28.67。 |
| 住房融入 | 人身权利侵害 | 3047 | 累加得分,最小值为 1,最大值为 8,平均值为 2.02,标准差为 0.73。 |
| | 对企业有没有意见 | 3084 | 没有意见(24.42%),有意见(75.58%)。 |
| | 住房类型 | 3086 | 集体宿舍(59.81%),出租屋(33.41%),自购房(1.22%),其他(5.56%)。 |
| | 人均住房面积 | 2628 | 最小值为 1,最大值为 110,平均值为 10.17,标准差为 9.77。 |
| | 住房质量 | 3086 | 累加得分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12,平均值为 5.49,标准差为 2.40。 |
| 社会融入 | 亲密朋友数量 | 3006 | 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300,平均值为 7.39,标准差为 14.77。 |
| | 最好的三个朋友 是否是当地人 | 2373 | 0 个(93.76%);1 个(4.93%);2 个(0.72%);3 个(0.59%)。 |
| | 组织参与 | 3086 | 累加得分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5,平均值为 0.18,标准差为 0.53。 |
| | 对当地语言的 熟悉程度 | 3084 | 完全可以听说(24.35%),基本可以听说(16.76%),能听但不能说(13.59%),能听一些但不能说(26.78%),既不能听也不能说(18.51%)。 |

突出,但农民工的精神健康躯体化问题也不容忽视。从躯体化来看,“失眠”“觉得身心疲惫”“烦躁易怒”问题应引起重视,三者经常有和很严重的比例分别达到 11.3%、19.7%、11.8%。从抑郁因子来看,“觉得生活没意思”“前途茫然”“感到很孤独”问题比较突出,三者经常有和很严重的比例分别达到 18.6%、15.6%、13.2%,这表明 15%左右的农具有较强的抑郁情绪。

表 3 农民工精神健康的基本情况 (%)

| | 没有 | 有时有 | 经常有 | 很严重 | |
|---------|------|------|------|-----|----------|
| 失眠 | 40.4 | 48.0 | 10.4 | 1.2 | (n=3077) |
| 觉得身心疲惫 | 26.2 | 54.1 | 17.5 | 2.2 | (n=3066) |
| 烦躁易怒 | 36.7 | 51.6 | 11.0 | 0.8 | (n=3057) |
| 容易哭泣或想哭 | 66.3 | 28.2 | 5.1 | 0.4 | (n=3038) |
| 觉得前途茫然 | 44.9 | 39.5 | 13.2 | 2.4 | (n=2914) |
| 感到很孤独 | 51.6 | 36.3 | 10.9 | 1.3 | (n=3052) |
| 觉得自己没有用 | 55.0 | 33.8 | 9.9 | 1.3 | (n=3017) |
| 觉得生活很艰难 | 40.7 | 40.8 | 16.3 | 2.3 | (n=3032) |
| 觉得活着没意思 | 78.0 | 18.1 | 3.1 | 0.8 | (n=3021) |

表 4 农民工精神健康因子描述分析

| | 躯体化因子 | 抑郁因子 | 精神健康总得分 |
|-----|-------|-------|---------|
| 均值 | 33.7 | 35.28 | 23.47 |
| 标准差 | 13.27 | 13.72 | 15.76 |

2. 模型及分析

为更好地说明城市融入状况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的影响,以精神健康因子总得分为因变量,在有统计控制的条件下使用一般线性回归方法进行分析。在回归模型中,我们逐一加入自变量,建立

三个模型(见表 5)。总体上看,城市融入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具有较强的预测力,控制变量和城市融入变量能够解释农民工精神健康 12.52% 的方差;同时根据三个模型的调整 R 平方以及 R 平方 change,可以发现经济融入对于农民工精神健康影响最大,能够解释农民工精神健康 9.71% 的变异量;其次为社会融入,可以解释农民工精神健康 1.09% 的变异量。

(1) 人口特征与精神健康

模型 1 解释力为 1.72%,表明人口特征变量对农民工精神健康具有一定的影响,性别、婚姻状况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具有显著的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模型 3 回归系数表明,年龄与农民工精神健康呈显著的负相关,而受教育程度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①男性的精神状况优于女性。模型 1 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男性与女性相比,男性的精神健康得分低 3.973 分,而且具有显著的统计性,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性。^[4,25]这可能与女性的心理特点、生理特点等有关,一是面对激烈的竞争压力时,女性特有的细腻感性心理特点,更容易产生紧张或抑郁的情绪;二是由于女性的生理特点,面临更多的社会排斥,所承受的生存压力更大,致使女性整体的精神健康状况差于男性。

②婚姻状况对于精神健康具有显著的影响。回

表 5 城市融入状况对农民工精神健康影响的一般线性回归模型

| 变量 | 模型 1 | 模型 2 | 模型 3 |
|----------------------------|--------------------|-------------------------|-------------------------|
| 性别 ^a | -3.973 *** (0.612) | -3.688 *** (0.642) | -3.674 *** (0.711) |
| 受教育程度 ^b | -0.708 (0.648) | -0.0149 (0.701) | -0.194 (0.763) |
| 婚姻状况 ^c | | | |
| 已婚但与配偶不住一起 | 1.923 ** (0.941) | 2.002 ** (1.013) | 0.932 (1.153) |
| 未婚 | 0.546 (0.930) | -0.128 (1.016) | 0.0885 (1.122) |
| 离婚或丧偶 | 6.904 *** (2.637) | 10.86 *** (3.001) | 18.15 *** (3.978) |
| 年龄 | 0.0341 (0.0526) | 0.0257 (0.0575) | 0.116 * (0.0662) |
| 经济融入 | | | |
| 月收支比 | | -0.355 * (0.198) | -0.473 ** (0.218) |
| 找工作难易程度 | | -0.0870 *** (0.0105) | -0.0718 *** (0.0117) |
| 签订劳动合同 ^d | | -0.160 (0.682) | 0.0943 (0.754) |
| 被扣工资情况 | | 5.850 *** (0.783) | 6.181 *** (0.859) |
| 保险获得因子 | | -0.0427 *** (0.0119) | -0.0478 *** (0.0129) |
| 人身权利侵害 | | 0.814 * (0.418) | 1.323 *** (0.473) |
| 对企业是否有意见 ^e | | 4.390 *** (0.728) | 3.436 *** (0.820) |
| 住房类型 ^f | | | |
| 出租屋 | | -0.120 (0.719) | -0.332 (0.789) |
| 自购房 | | 6.196 ** (2.903) | 4.372 (3.041) |
| 其他 | | 2.012 (1.424) | 1.509 (1.545) |
| 人均住房面积 | | -2.12e-07 ** (9.95e-08) | -2.26e-07 ** (1.10e-07) |
| 住房质量 | | -0.683 *** (0.146) | -0.667 *** (0.164) |
| 社会融入 | | | |
| 最好三个朋友有一个为当地人 ^g | | | 2.644 (1.536) |
| 最好三个朋友有两个为当地人 | | | 8.292 (4.265) |
| 最好三个朋友有三个为当地人 | | | -7.652 * (4.100) |
| 亲密朋友数量 | | | -0.00666 (0.0195) |
| 组织参与 | | | -1.121 * (0.610) |
| 对当地语言的熟悉程度 | | | -0.645 *** (0.241) |
| 常数 | 23.61 *** | 27.72 *** | 21.91 *** |
| 样本量 | 2729 | 2286 | 1751 |
| 调整 R 平方 | 0.0172 | 0.1143 | 0.1252 |
| F | 8.94 *** | 17.38 *** | 11.44 *** |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0.01$,** $P<0.05$,* $P<0.1$;a的参照类别为“女”,b的参照类别为“初中及以下”,c的参照类别为“已婚且与配偶住一起”,d的参照类别为“否”、e的参照类别为“否”,f的参照类别为“集体宿舍”、g的参照类别为“最好三个朋友没有一个为当地人”。

归系数表明,与已婚且与配偶住在一起的相比,已婚但与配偶不在一起的得分要高 1.923 分,表明已婚且与配偶住在一起的精神健康状况明显较好。在流动的过程中,有配偶的陪伴与支持能够减少农民工的心理压力;因此家庭式迁移的城市融入对于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丧偶或离婚者的精神健康水平明显低于已婚且住在一起的农民工,完整婚姻对于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具有保护作用,但破裂的婚姻会损害农民工的精神健康。

③年龄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有一定的影响。模型 3 结果表明,年龄每增长 1 岁,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得分高 0.116 分,这表明年龄越大的农民工,精神健康水平较差。相关研究认为年龄越大者,越可能建构自身的家庭,面临整体的家庭经济压力越大,或因身体、生理的因素,精神健康疾病问题可能

更加突出。^[4]

(2) 经济融入与精神健康

模型 2 显示,在加入经济融入相关变量后,解释力提高了 9.71%,表明经济融入对于精神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除签订劳动合同外,其他经济融入变量均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产生显著影响,假设 1.1、1.2、1.3 基本得到证实。

①劳动力市场融入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呈显著的影响。以往的研究只单纯考察工资水平,忽略了消费支出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作用。本研究构建月收支比辅助变量纳入回归模型,模型显示,月收支比的回归系数为-0.355,且具有显著统计性,假设 1.1a 得到验证,这表明农民工的月收入和支出的比值越高,农民工的经济生活压力越小,其精神健康状况越好。找工作容易程度对农民工精神

健康具有显著的影响,找工作越容易者,其精神健康得分越低,假设 1.1b 得到验证。在低收入和低职业地位中,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是频繁的^[26],多数的职业流动只是“平移”,并没有带来职业地位的上升,但越能够实现职业流动者,能够排解其职业倦怠,实现自我价值,其价值感和自我焦虑较少,精神健康状况较好。

②劳动保护融入对精神健康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不具有显著的影响,劳动合同并未给农民工的精神健康起到保护作用,假设 1.2a 未得到证实。与没有被扣工资者相比,被扣工资者的精神健康得分高 5.850 分(模型 2),被扣工资者的精神状况更差,假设 1.2b 得到证实。农民工外出主要动机是经济取向和个人发展,被扣工资者,其经济动机实现程度较低,经济压力较大,导致负面情绪产生,危害精神健康。保险获得因子与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呈负相关,且具有显著统计性,假设 1.2c 得到验证。与以往的研究保持一致性,工厂的福利情况影响农民工的精神健康水平^[18],农民工获得保险福利越多,对于其工作和心理起到一个保障作用,能够调适其精神健康。遭受人身权利侵害越多,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越差,人身权利侵害每多一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得分高 0.814 分,假设 1.2d 被证实。高强度的劳动控制限制农民工的自主性,工作场所的强迫、暴力给农民带来心理不安和恐惧,因独特的工厂体制带来的人身权利侵害极大的恶化农民工精神健康。相比较对企业没有意见者,对企业有意见者精神健康得分高 4.390 分,精神健康状况较差,假设 1.2e 得到支持。对劳动权益是否有意见反映了劳动者权益意识,权益意识感越强,越能够意识到权益问题的存在,更容易产生精神健康问题。^[17]

③住房融入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发挥着重要作用。模型 2 表明,与居住在集体宿舍的农民工相比,居住在出租房或其他地方的农民工的精神健康没有显著的差异,但自购房的农民工精神健康更差,假设 1.3a 未得到验证。自购房者在经济上面临着还贷,维持日常高生活开支,经济压力过大,是其心理压力的一个直接来源。与住房类型不同的是,住房人均面积和住房质量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假设 1.3b、1.3c 得到证实。人均住房面积越大者,其精神健康状况越好,住房质量越高,精神健康状况越好;拥挤局促的居住环境,将影响到农民工的身体健康^[19],也不利于

农民工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无形之中给农民工增加心理压力,这表明居住环境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产生积极效应。

(3) 社会融入与精神健康

在加入社会融入的相关变量后,模型 3 的解释力增加 1.09%,同样表明社会融入对于农民工精神健康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其中,最好三个朋友全部为当地人、对当地方言的熟悉程度、组织参与通过显著性检验,亲密朋友数量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假设 2 基本得到证实,假设 2a 未得到验证。

①农民工的新生的社会网络有助于农民工的精神健康。模型 3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与最好三个朋友没有当地人的农民工相比,最好三个朋友全部为当地人的精神健康水平得分低 7.652 分,而且具有显著的统计性;假设 2b 部分得到证实。最好三个朋友全部为当地人,表明农民工的新生社会网络逐渐进入到当地人的核心层面,弱化对乡土社会网络的依赖,在与本地人的交往中,农民工与本地人增进相互了解,有助于消除原来由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差异带来的隔离,面临的社会排斥感较弱,精神健康状况可能较好。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的新生社会网络总体较弱,最好三个朋友中没有当地人占到 93.76%,最好的三个朋友全部为当地人仅为 0.59%,这表明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圈子主要是工友和老乡,难以融入当地人的社会网络,与市民和主流的文化相隔绝,生活被固定在“车间—宿舍—食堂”三点一线上,生活空间被隔离,单调的生活方式和封闭、压缩的社会交往空间,使得出现精神健康问题的农民工,难以消解,易出现精神疾病。

②方言的掌握程度与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具有显著的影响。在回归模型 3 中,方言掌握程度的回归系数为 -0.645,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对当地语言越熟悉者,精神健康得分更低,精神健康水平较好,假设 2c 得到验证。对当地的语言越熟悉,越容易与本地人进行交流,越可能融入当地人的圈子和生活中,面临的排斥和歧视会较弱,精神状况可能更佳。因而消除农民工与本地人的交往障碍,需要消除语言的具体障碍,促进农民工更好的融入当地的城市生活,改善其精神健康。

③组织参与越多,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越好,数据表明,组织参与每多一个,其精神健康得分低 1.121 分,假设 2d 得到证实;党组织、工会、共青团、女工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其成员提供社会

支持或服务,同乡会给农民工起到物质支持和精神慰藉的作用,缓解心理压力,促进精神健康。

五、结论与讨论

研究表明,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总体不佳。总体来看,城市融入是农民工精神健康的重要预测变量,城市融入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其精神健康状况更好。具体而言,劳动力市场融入状况越好,月收支比越高,找工作越容易者,劳动权益保护融入状况越好,其精神健康水平越高。被扣工资、保险获得、人身权利侵害、对企业是否有意见是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重要显著变量。住房融入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发挥着显著的积极作用。在流动地中的社会融入,包括配偶的支持、新生的社会网络、方言掌握程度、组织参与等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具有较强的保护效应。

研究认为,“流动的劳动体制”致使农民工难以全面融入城市,深入影响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国家继承了原来社会主义时期的制度遗产以强化其能力,强化了基于户口、籍贯、阶级和性别的差异建构,户籍制度奠定了流动的基础,而地方政府利用了城乡二元结构使自己从中获益,国家、地方政府、资本共同编织的“流动的劳动力体制”^[16,27-28]。在流动的劳动体制中,城乡户籍制度使得就业、社会保障、劳动保护制度等社会体制存在严重的二元分割,户籍制度将农民工的身份符号化和标签化,预设农民工的资源和权益,构成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体制性障碍,致使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主流的劳动力市场;在次级的劳动力市场从事低收入、风险高、稳定性不高的工作,工资、社会保障、人身权利等劳动权益难以获得与市民同等的待遇,且劳动权益屡受侵犯,经济融入程度低;不平等的经济地位和可支配的资源与精神健康有直接的联系,经济上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农民工在处理负面应激事件可支配资源少,势必影响到农民工的精神健康。^[4]在流动的过程中,原有的社会支持体系被打破,在城市生活主要依赖乡土社会网络,乡土的社会网络有助于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但也束缚其新的社会网络生成,社会交往群体具有内卷性和封闭性,交往群体被压缩在工友和老乡群体中;与本地居民形成交往隔离,被城市主流群体所排斥,经济和心理排斥感较强,农民工逐渐建构自身的社会空间,形成一种区隔型融入,自身社会空间内部的同质性和外部

社会异质性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产生很大的影响。^[7]面对流动的劳动体制带来的种种差异建构,农民工产生强烈的经济排斥感和社会排斥感,农民工徘徊在城市与制度的边缘,成为城市社会的边缘人,既难以扎根城市,又难以回到农村,在心理上难以融入城市;在频繁的社会空间转换和城乡流动过程中,农民工往往容易丧失了自我的空间感和位置感,这种空间感和位置感会极大的影响农民工的精神健康。^[18]

本研究具有的政策意涵是:应加速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促进农民工全面的城市融入,全面改善农民工的精神健康。首先,在户籍制度设计上,应该进行多方位改革,改变因户籍制度而带来的就业、劳动保护、住房保障等的差异建构,在制度上为农民工创造更多的制度型社会资本,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劳动权益,降低农民工的精神健康风险。其次,家庭式融入有助于降低农民工的精神健康风险,但在家庭式的融入过程中,相关部门应努力改善农民工的住房条件,整体优化农民工的住房环境,减少因过度拥挤和低劣的住房质量而带来的一系列精神健康风险。再次,正确引导和积极推动老乡会等非正式组织以及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社会组织为农民工提供精神健康和社会支持服务,改进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最后,应努力消除语言障碍,积极培育农民工新生社会网络,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提升农民工的精神健康水平。

参考文献:

- [1] Fothergill K. E., et. al. Effects of Social Integration on Health: A Prospective Study of Community Engagement among African American Women [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1 (72):291-298.
- [2] Cohen S.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Health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4 (11):676-684.
- [3] 陈旭峰,等. 社会融入状况对农民工组织化的影响研究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1):56-63.
- [4] 胡荣,等. 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分析 [J]. 社会,2012(6):135-157.
- [5] 何雪松,等. 城乡迁移与精神健康:基于上海的实证研究 [J]. 社会学研究,2010(1):111-129.
- [6] 廖传景,等. 城市农民工精神健康及群体差异调查研究——以浙江省温州市为例 [J]. 生态经济,2010(5):183-184.
- [7] 刘东. 结构性制约与精神健康——基于上海外来人口的实证研究 [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 (1):12-18.
- [8] 胡宏伟,等.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与求助行为研究[J].西北人口,2011(5):27-33.
- [9] 郭星华,等.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与精神健康——基于北京和珠三角地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甘肃社会科学,2012(4):30-33.
- [10] 王佃利,等.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框架建构与调研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1(2):111-115.
- [11] 刘建娥.乡—城移民社会融入的实践策略研究——社会融入的视角[J].社会,2010(1):127-151.
- [12] 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2002(6):82-88.
- [13] 杨菊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基于社会融入理论的进一步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0(2):64-70.
- [14] 胡荣华,葛明贵.对408名城市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8(3):196-198.
- [15] 曾强,等.失业对精神与躯体健康的影响[J].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2000(1):13-16.
- [16] 刘玉兰.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1(5):99-105.
- [17] 刘林平,等.劳动权益与精神健康——基于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外来工的问卷调查[J].社会学研究,2011(4):164-182.
- [18] 郑广怀.迈向对员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学理解[J].社会学研究,2010(6):201-219.
- [19] 牛建林,等.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和居住环境及其健康效应[J].人口研究,2011(3):64-75.
- [20] 郝小艳.农民工社会融合与健康——社会支持网的调节作用[D].太原:山西师范大学,2012.
- [21] R. Rose. How much does social capital add to individual health[J].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2000, 51(9): 1421-1435.
- [22] 赵延东.社会网络与城乡居民的身心健康[J].社会,2008(5):1-19.
- [23] 边燕杰,刘勇利.社会分层、住房产权与居住质量——对中国“五普”数据的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5(3):82-98.
- [24] 蔡禾,曹志刚.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及其影响因素——来自珠三角的实证分析[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48-158.
- [25] 詹劲基,等.流动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现状[J].医学综述,2008(1):158-160.
- [26] 陈媛媛.工作转换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基于珠三角两代农民工的调查[J].南方经济,2013(3):1-12.
- [27] Hu X, et al.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Floating Chinese Population[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2002(3): 536-552.
- [28] C. Cindy Fan. The State, The Migrant Labor Regime, and Maiden Workers in China[J]. *Political Geography*, 2004, (23): 283-305.

(责任编辑:李良木)

The Urban Inclus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Mental Health: Based on a Survey in the Zhujiang Delta Area

NIE Wei, FENG Xiaotian

(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Few studies had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grant workers' urban inclusion and their mental health, especially there had been a lack of empirical studies with appropriate large samples. Based on a survey on 3086 migrant workers in 9 cities in the Zhujiang Delta Area,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migrant workers' mental health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grant workers' urban inclusion and their mental health.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y have poor mental health and that economic inclusion (labor market, labor protection and housing integration) has significant impact on migrant workers' mental health. Social inclusion plays a regulatory role in migrant workers' mental health. With the flow of labor system, migrant workers find it difficult to fully integrate into the city, which undermines their mental health.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the efforts to promote migrant workers' citizenship and let migrant workers integrate into city life made from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will be an effective measure to enhance their mental health.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 Urban Indusion; Mental Health